

家庭關係對弱勢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

陳憶¹ 陳柯玫²

摘要

家庭關係在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對生活在弱勢處境的青少年影響更甚，然而，國內較少關注家庭關係與弱勢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關係對弱勢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資料來源為 2017 年「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第五波資料，研究對象為 12-24 歲身處在弱勢家庭之青少年，使用多元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家庭關係的良窳確實會影響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亦即家庭關係愈佳，個人主觀幸福感愈高。另外，本研究亦發現青少年的自評健康狀況與心理困擾是預測其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簡言之，家庭關係、自評健康狀況以及心理困擾對於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福利政策或非營利組織如欲提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可以從這三面向著手。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家庭關係、生活滿意度、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

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研究生

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陳柯玫，E-mail: kmchen@mail.npust.edu.tw

收稿日期：2019/03/11；接受刊登日期：2019/06/20

DOI:10.6284/NPUSTHSSR.202003_14(1).3

壹、前言

近年來，我國對於青少年的議題日益重視，包含權益、發展與培育。而我國於 2011 年修正公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指出應促進兒童及少年（簡稱兒少）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此外，社團法人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為民間團體，宗旨在於「讓政策成為青少年的力量」，為關注與推動青少年福利與權益政策。由此可知，無論是生理或是心理層面，青少年的權益應受到重視。青少年心理層面之幸福感尤其重要，不只是影響其本身的心理健康，影響範圍亦涵蓋到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甚至是整個國家的健全發展。目前我國面臨少子化議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福利顯得更加重要（社團法人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2019）。

但是，根據 2014 年兒少健康聯盟公布之「臺灣兒童健康幸福指數」，在主觀幸福感面向，臺灣於 21 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排名第 19 名，從此排名可知，我國兒少的主觀幸福感明顯偏低（呂鴻基等，2014）。兒少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7）也針對兒少福祉進行實體問卷調查，發現兒少主觀生活滿意度有退步的趨勢，顯示兒少對於自己及生活的滿意程度正在下降。另外更指出，家人陪伴兒少的機會持續地減少，親子相處的時間越來越不足。倘若與兒少最親近的家人都沒有時間與機會傾聽他們的心事及困擾，兒少如何對生活感到滿意及幸福呢？

那麼要如何提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呢？首先，必須瞭解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因素才能著手改善。然而，影響因素範疇相當廣闊，因素之間也互相影響著。即便如此，我們仍可從與青少年最親密的領域——家庭，來瞭解影響其主觀幸福感的成因。由於家庭為青少年最早接觸之社會化場域，接觸最頻繁，影響也最深刻。葉光輝等（2016）指出，當子女於家庭中，能滿足其對自主、勝任及連結等三種基本需求時，可以在自然且沒有威脅的環境下自在地成長，並認識自我，有助於其生活上的適應。

家庭有教育、保護與照顧之功能，然而現今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改變、以及家庭問題趨於複雜化，導致家庭之教養及保護的功能逐漸弱化，親子關係也受其影響。在此類家庭成長的小孩，身心靈發展可能受到限制及阻礙，進而產生偏差行為，甚至是自我傷害或自殺。根據衛生福利部「106 年死因統計」指出，自殺為青少年（15-24 歲）死因的第二位，占 16.7%，次於事故傷害（45.8%）（衛生福利部，2018）。相關研究發現，青少年較高之自殺意念，受其自覺家庭支持程度所影響，顯示家庭關係為影響青少年自殺意念之影響因素之一（陳錦宏等，2008）。此外，當家庭結構穩定，家庭關係良好，有助於提升兒少幸福感（盧妍伶、呂朝賢，2014；林麗玲，2006）。

目前我國雖然已經有許多相關文獻探討家庭因素對兒童或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呂朝賢、呂慧玲，2014；林惠雅、林麗玲，2008；林麗玲，2006；許

婷婷、林惠雅，2011；盧妍伶、呂朝賢，2014；Saunders and Chen, 2015），但國內對於家庭關係與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偏少，大多以國外實證研究居多（Brown, 2004；Robson, 2010；Thomson and McLanahan, 2012）。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家庭關係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力。根據我國「青少年政策白皮書」之定義，青少年是指 12-24 歲之人，而聯合國「世界青年行動綱領」也將青少年界定在 15-24 歲，因此，本文所指青少年的年齡介於 12-24 歲之間。研究資料來源為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稱家扶基金會）所建置之「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使用 2017 年第五波作為分析資料，並採多元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進行資料分析，期望研究結果可作為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在擬定弱勢青少年福利措施提升其幸福感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主觀幸福感之意涵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一種主觀的情緒感受，也是抽象的概念，每個人對外在刺激的主觀感受以及想法都不同，對於幸福的定義也有所差異，且個體主觀認知所感受到的經驗對其幸福感之構成是相當重要的。有關幸福感的相關意涵，不同學者有其獨特的見解。總歸而言，主觀幸福感係指個人透過主觀想法來評價其生活品質，以及對於其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換句話說，即個人透過自身的情緒與反應來界定其生活是否美好與美滿（陸洛，1998；彭錦鵬、李俊達，2014；葉秀珍，2014；鄭清霞、呂朝賢，2013）。

也有相關研究指出，主觀幸福感是一種複合的概念。Angner（2010）認為主觀幸福感由認知（cognitive）與情緒（affective）所組成。鄭清霞和呂朝賢（2013）將主觀幸福感分為持有、執有、思有，其中持有指個體所擁有的資源，如物質、人力及社會；執有是個體是否妥善運用其資源；思有則是個體對於所經驗事物的評價與主觀感受，以及其對於個體的意義。

關於主觀幸福感的測量，陸洛（1998）將歸納出主觀幸福感之九大來源作為評估依據，包含：自尊、人際關係、金錢、工作成就、對生活之滿意、與他人比較、自我控制與理想實現、快樂。然而，對於兒少而言，主觀幸福感的來源與影響或許不同。Fattore et al.（2007）針對 8 歲至 15 歲兒少進行其福祉研究，並提出五項影響兒少福祉的指標，其一為自主與能動性，指擁有自由行動與做決定的自主性；其二為安全和保障感，指出對個人的安全感及保障能夠感到安心；其三為自我，由兒少對自己的正面感受作為定義；其四則為物質來源，指經濟是否足以讓「整個家庭」有高品質的生活，而非單指個人；最後則為物質環境與住家，能夠讓兒少得以進行休閒活動與自在表現自我的場域。透過兒少主觀的表態，得以了解兒少真實主觀感受，並建構出此五項指標，反映出其心中的現實世界（黃聖峰、鍾青萍，2011）。

二、影響主觀幸福感之相關因素

主觀幸福感既是多面向的概念，更是抽象的個人價值觀，因此，影響主觀幸福感不會只有單一的因素。目前國內外已有許多相關文獻來分析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林崇逸，2007；陸洛，1998；彭錦鵬、李俊達，2014；Hayes and Joseph, 2003；Saunders and Chen, 2015）。彭錦鵬和李俊達（2014）認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可以區分為關係歸屬、生活條件、家庭經濟收入三個面向，其中，關係歸屬涵蓋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宗教信仰、環境品質；生活條件則包含工作狀況、健康狀況、治安狀況、未來發展樂觀度、政治權利、地方政府滿意度、首長施政滿意度等八個變項；而家庭經濟收入面向即是以家庭經濟收入為觀察變項。

個人特質也會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水準，可由「五大人格特質」來檢視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其內涵包含外向性（extraversion）、神經質（neuroticism）、勤勉審慎性（conscientious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及經驗開放性（openness）。相關研究證實，此五大人格特質，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也就是個體外向性越高、神經質越低、勤勉審慎性程度越高、友善以及聰穎開放的人格特質，其幸福感較高（Hayes and Joseph, 2003）。

在自評健康部分，林衢良、林淑芬（2005）指出，大學生的自評健康狀況與其整體幸福感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而余民寧等（2012）進一步說明，個體可能因生理或心理等因素而認為自己不健康，但若個體能夠負起自身健康責任，並實行對自身健康有幫助的活動與行為，那麼將可提升個體之幸福感。也有研究指出，青少年自評健康狀況與其幸福感須以青少年對自己身體意象為中介因素，才有顯著正向預測力，亦即青少年主觀對自己身體的認知與其自評健康狀況相關，並進一步影響其幸福感（吳枚瑛等，2018）。

青少年心理方面的困擾與其幸福感同樣具有正向關係，根據王爾暄等（2017）研究結果，生活緊張因素如國中生之生活負面事件會直接影響其主觀幸福感，該研究提出四種影響國中生幸福感之日常生活困擾：生活困擾、未來困擾、課業困擾以及管教困擾，其中又以生活困擾對幸福感之影響最深。由於個人在青少年階段經常受到各種困擾所苦，其苦惱自責會影響憂鬱程度，導致其尋求自我傷害的行為（陳進義，2012）。而青少年憂鬱程度愈高，愈感到不幸福（Flouri and Buchanan, 2003）。

關於性別與幸福感的關係，過去研究在針對不同年齡層受訪者、研究範疇、樣本規模以及幸福感測量指標等所獲得之結果不盡相同。陸洛（1998）及黃春太等（2008）分別以居住高雄市 18-65 歲和臺南縣公立學校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性別對於幸福感有一定的影響力，且女性幸福感比男性幸福感高。相反地，也有研究發現男性幸福感高於女性（彭錦鵬、李俊達，2014；黃韞臻、林淑惠，2008），這些研究的規模較大，抽樣範疇與年齡層分布較廣，例如彭錦鵬和李俊達（2014）執行的調查地區共 22 個縣市，共訪問 16,864 設籍臺澎金馬 20 歲以上民眾（陸洛，1998；黃春太等，2008）。不過，少數研究卻也顯示，性別對於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性（林惠雅、林麗玲，2008）。

再者，社會支持也是影響個人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會支持越高，越感到幸福（林子雯，2000；劉熒潔等，2013）。陸洛（1998）指出，「社會支持」是個人面對與調適生活中所面臨之壓力的重要資源，其與幸福感也存在正相關。而李志恭（2012）研究更是發現，在社會支持面向中，以情緒支持對幸福感最具有影響力，其次是工具支持與訊息支持。

在家庭方面，林崇逸（2007）運用「幸福與財富調查資料庫」進行實證分析，透過人口統計變項、人口特質以及金錢觀三個面向探討幸福感。研究發現，家庭是影響幸福感最主要的成因，其中，家庭不和睦是造成個人感到不幸福最主要的因素。由此可見，家庭對於幸福感的組成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國外目前已有相當多研究探討家庭結構對幸福感的影響（Brown, 2004; Thomson, McLanahan, 2012; Låftman, 2010; Robson, 2010）。Bjarnason et al.（2012）指出，相較於單親家庭及繼親家庭，生活在完整家庭（intact family）中的兒童，生活的滿意度較高；相反的，居住於分居家庭中小孩，其生活滿意度相對較低。而 Robson（2010）研究發現，親生父母親，無論是已婚的雙親家庭或是同居家庭，對於孩子的幸福感及自尊心都有正向的影響，相對地，繼親家庭則多半對孩子的幸福感產生負向的衝擊。

Brown（2004）認為家庭結構對兒童幸福感影響的理論機制有兩個面向，經濟資源、父母資源和社會化。由此可見，家庭結構著實會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和自尊心，且家庭中的經濟資源亦會影響青少年幸福感。不過，國內研究則有不同的結果，盧妍伶與呂朝賢（2014）研究發現，有形的資源（如經濟資源與居住環境）對於兒童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不高，真正會影響兒童幸福感的是無形的資源，包含婚姻關係、教養方式、人際關係、親職品質、心理健康與陪伴等。

另外，貧窮和剝奪（deprivation）對於兒少個人主觀幸福感也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尤其是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兒少，其主觀幸福感也會受到影響（Saunders and Chen, 2015）。貧窮與兒童幸福感除了呈現負相關，也會透過家庭結構影響兒少的幸福感，從另一角度來看，經濟上的貧困會影響父母的心理狀況，使其狀況不佳，進而損害到其養育子女的有效性（Brown, 2004; Dinisman et al., 2017）。

三、家庭關係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

青少年幸福感與否與其所知覺的家庭氣氛相關，也就是說，促進青少年整體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為其家庭的穩定性、家庭成員的正向互動以及家庭成員間沒有衝突及明顯矛盾（Joronen et al., 2003）。幸福感會受到家庭氣氛、同儕關係、師生關係以及參與活動活躍性之影響（黃春太等，2008）。再者，父母參與青少年生活的程度與青少年的快樂感有關，例如：父母願意花時間陪伴、與青少年談論其憂慮、對學校生活感到興趣等等，都會提高青少年的快樂感（Flouri and Buchanan, 2003）。國內研究同樣指出，兒童幸福感歸因於其家長的陪伴及參與，當家長與孩子相處時間長、相處品質高，將可增進兒童的幸福感（盧妍伶、呂朝賢，2014）。由此可知，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家庭的氛圍，對於兒少幸福感相

當的重要，尤其兒少與家庭場域的接觸最為頻繁及深刻，因此，探討家庭關係與兒少幸福感的關係有其重要性。

談及家庭關係，有研究進一步探討家庭關係型態對兒少幸福感的影響。林惠雅與林麗玲（2008）將家庭關係型態區分為三種，即「親愛扶持型」、「衝突但有連結型」、「疏遠且衝突型」，「親愛扶持型」家庭關係型態的青少年，幸福感程度最高；相對的，「疏遠且衝突型」的家庭關係型態，青少年所知覺之幸福感程度最低，「衝突但有連結型」則是居於第二位。除此之外，許婷婷和林惠雅（2011）的研究也指出，母親的教養行為若採用「溫情引導教養」、與母親關係為信任及溝通，則會對青少年幸福感之整體生活滿意度與正向情感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相對的，若採用「嚴厲教養」的方式、與母親關係疏離，則對於負向情感有顯著影響。

此外，也有研究提出與前述不同的論點，「家庭內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之間不存在直接相關，必須經由「家庭外社會資本」才會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產生間接的影響關係。「家庭內社會資本」涵蓋家庭人際互動、家人對青少年的關注、家庭連結及家庭規範四個面向，「家庭外社會資本」則指家庭社會支持、社區鄰里關係、少年同儕關係、少年師生關係。此研究發現，家庭內社會資本與家庭外社會資本之間有正向關係，說明提高青少年家庭內社會資本，能夠強化家庭外社會資本（柯旻伶等，2015）。儘管如此，目前仍有許多相關文獻指出，家庭內的關係、家庭連結與家庭人際互動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假設：家庭關係愈差者，其主觀幸福感越低。

參、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資料來源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¹（Taiwan Databa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verty, TDCYP）執行之「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為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8），此資料庫為家扶基金會於 2008 年所建置，屬於全國性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2009 年開始第一波調查，每兩年調查一次，至 2017 年已完成第五波調查。受訪者皆為家扶基金會扶助之弱勢兒少，調查內容包括生活樣貌、生心理、學校、家庭以及福利服務層面。本研究使用 2017 年第五波資料，研究對象之年齡介在 12-24 歲的青少年，分析樣本為 1,618 人，其中，12-17 歲有 421 人，18-24 歲有 1,197 人，後續將研究對象分成「12-17 歲」和「18-24 歲」兩個群體進行分析。

¹ 本文（部份）資料來源為「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該調查資料由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執行並釋出。作者感謝家扶基金會提供調查資料協助，本文內容將由作者自行負責，不代表家扶基金會之立場。

二、研究變項

(一) 依變項：主觀幸福感²

以「生活滿意度」來評估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問項為「我對我的生活很滿意」，答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普通、有點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屬於七點量尺（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總分最高 7 分，最低 1 分，得分越高者即代表主觀幸福感越高。

(二) 自變項：家庭關係

受訪者的家庭關係評估係採用問卷中「家人相處或互動的情形」15 題問項所組成，部分問項來自 Olson（1985）編制之「家庭適應與凝聚力評估量表」第三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FACES III），而國內少數研究也使用該「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中之「家人相處或互動的情形」題組分析親子關係或家庭凝聚力（江守峻、陳婉真，2017；劉亭秀、陳柏霖，2017）。大體而言，家庭關係涉及親子關係、家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家庭凝聚力，因此本研究使用所有問項來測量青少年之家庭關係。

「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詢問受訪者：「下列是關於家人相處的情形，是否符合你家中的情況？」，問項包括：1. 家人彼此間的關係比和外人的關係來的密切；2. 家人彼此間覺得很親近；3. 做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量；4. 家人喜歡共度休息時光；5. 我們喜歡一家人共同做某些事；6.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家人那得到安慰；7. 我覺得家人很重視我；8.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9. 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10. 我覺得家人很重視我；11. 我和家人能彼此相互體諒；12. 家人會彼此口頭鼓勵；13. 家人能敏銳察覺我的想法與感受；14. 家人知道我同儕家裡的狀況；15. 家人會告訴我做人處事的道理。各題答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同意（=3）以及非常同意（=4），屬於四點量尺。本研究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萃取出 1 個因素，該因素的總解釋變異量為 58.18%，因此保留所有問項，命名為家庭關係。此外，本研究測得家庭關係題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Cronbach's α ）為 0.946，顯示該題組具有良好的信度。取各題得分的平均值，平均分數最低分 1 分，最高 4 分，分數越高者即代表家庭關係越好。

(三) 控制變項

1. 性別：包含「男性」與「女性」，屬於虛擬變項，「男性」編碼為 0，「女性」編碼為 1。
2. 年齡：分成「12-17 歲」和「18-24 歲」兩類，屬於虛擬變項，前者為參考組，「18-24 歲」編碼為 0，「12-17 歲」編碼為 1。
3. 父或母教育程度：採用父或母的最高教育程度，分成五類：「國小（含）以下」（包括不識字）編碼為 1、「國中」編碼為 2、「高中」編碼為 3、「大學及研究所以上」編碼為 4，屬於順序變項。

² 本文參照 Niaz et al.（2018）、Cai and Park（2016）以及 Cuesta and Budría（2012）等人研究，使用單一指標（生活滿意度）測量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

4. 家庭規模：受訪者之家庭成員總人數，屬於連續變項。
5. 家庭排行：受訪者在手足中的排行，屬於順序變項。
6. 家扶扶助狀況：2017 年是否接受家扶扶助，為虛擬變項，「否」編碼為 0，「是」編碼為 1。
7. 低收入戶補助：2017 年是否接受政府中低收入補助，問項包含「低收入戶資格」、「中低收入戶資格」、「無申請政府補助」、「未填答」。本研究合併答項，分成兩類，為虛擬變項，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則編碼為 1，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和無申請政府補助」編碼為 0，未填答選項者予以排除。
8. 自評健康：在自評健康狀況項目中，其答項分別為很差（=1）、差（=2）、普通（=3）、好（=4）、很好（=5），為五點量尺。分數愈高，表示自評健康狀況愈佳。
9. 心理困擾：以問卷中「苦惱或困擾」題組進行測量，題目為：「請你仔細回想在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下列題項使你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度」，共有 5 題問項：1. 感覺緊張不安；2.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3.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4. 覺得比不上別人；5.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其答項分別為完全沒有（=1）、輕微（=2）、中等程度（=3）、厲害（=4）、非常厲害（=5），屬於五點量尺。本題同樣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僅萃取 1 個因素，此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9.52%，故保留所有問項，命名為心理困擾。就該題組進行信度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Cronbach's α ）為 0.886，表示心理困擾題組具有良好信度。同樣取各題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分 1 分，最高 5 分，總分愈高，表示受訪者的心理困擾愈嚴重。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分析青少年的家庭關係與其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瞭解家庭關係愈差者，青少年主觀幸福感是否會愈低。

肆、分析結果

一、樣本特性之描述性統計

表 1 為青少年樣本描述性統計，全樣本主觀幸福感平均數 4.24，標準差 1.4；女性人數較多，占 54.8%。父親或母親普遍教育程度不高，以國高中為最大宗（36.0%、48.3%）。至於家庭規模，以四口之家比例最高，占總數的 31.7%，平均 3.4 人。而受訪者在手足中排行以排行第二位的比例最多，高達四成（40.0%），其次排行第一位（29.5%）。在家扶扶助方面，將近九成（89.7%）的受訪者持續接受家扶扶助。在是否接受政府低收入戶補助項目中，約半數受訪者（55.7%）的家庭接受低收入戶補助。受訪者自評健康平均分數為 3.57，標準差 0.94；心理

困擾平均數為 1.89，標準差 0.85。最後為家庭關係，在本研究受訪者當中，家庭關係平均分數為 3.00，標準差為 0.5。進一步檢視 12-17 歲和 18-24 歲青少年，其樣本特性與整體樣本差異不大。惟 12-17 歲青少年主觀幸福感（4.49）和自評健康（3.64）平均分數皆略高於 18-24 歲青少年（4.15、3.55）。

表 1 研究描述性統計

變項	全樣本		12-17 歲		18-24 歲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主觀幸福感 ^a	4.24	1.4	4.49	1.43	4.15	1.39
年齡						
12-17 歲	421	74	--	--	--	--
18-24 歲（參考組）	1,197	26	--	--	--	--
性別						
男性（參考組）	732	45.2	205	48.7	527	44.0
女性	886	54.8	216	51.3	670	56.0
父或母親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121	9.6	30	8.9	91	9.8
國中	456	36.0	111	32.8	345	37.1
高中職	612	48.3	172	50.9	440	47.4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78	6.2	25	7.4	53	5.7
家庭規模 ^a	3.39	1.36	3.37	1.34	3.39	1.37
家庭排行						
排行第一	476	29.5	116	27.6	360	30.1
排行第二	647	40.0	165	39.3	482	40.3
排行第三	376	23.3	103	24.5	273	22.8
排行第四	94	5.8	24	5.7	70	5.9
排行第五	18	1.1	9	2.1	9	0.8
排行第六以上	5	0.3	3	0.7	2	0.2
家扶扶助						
已停扶（參考組）	166	10.3	39	9.3	127	10.6
扶助中	1,452	89.7	382	90.7	1,070	89.4
低收入戶補助						
否（參考組）	708	44.3	182	43.8	526	44.5
是	890	55.7	234	56.3	656	55.5
自評健康 ^a	3.57	0.94	3.64	0.97	3.55	0.93
心理困擾 ^a	1.89	0.85	1.89	0.86	1.89	0.85
家庭關係 ^a	3.00	0.50	3.00	0.49	3.00	0.51

^a 為連續變項，描述統計結果係指「平均數／標準差」

表 2 為全部研究樣本特性分析，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驗各變項在主觀幸福感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在獨立樣本 t 檢

定部分，年齡與主觀幸福感間達顯著差異（ $t=-4.172$ ， $p<.001$ ），但性別、家扶扶助、低收入戶補助與主觀幸福感間則無顯著差異。而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父或母親教育程度及家庭排行皆未達顯著差異。最後，在連續變項與主觀性感之相關分析中，自評健康（ $r=0.361$ ， $p<.001$ ）、心理困擾（ $r=0.378$ ， $p<.001$ ）與家庭關係（ $r=0.415$ ， $p<.001$ ）皆與主觀幸福感間達顯著相關，惟家庭規模未達顯著差異（ $r=0.020$ ， $p>.05$ ）。

表 2 研究樣本特性分析

變項名稱		主觀幸福感		t 值、F 值、r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12-17 歲	4.49	1.427	$t=-4.172^{***}$
	18-24 歲（參考組）	4.15	1.385	
性別	男性（參考組）	4.23	1.441	$t=-0.316$
	女性	4.25	1.372	
	小學以下	4.30	1.358	
父或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	4.23	1.394	$F=1.174$
	高中職	4.21	1.420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4.51	1.287	
家庭規模				$r=0.020$
家庭排行	排行第一	4.26	1.346	$F=0.934$
	排行第二	4.26	1.400	
	排行第三	4.19	1.470	
	排行第四	4.34	1.418	
	排行第五	3.67	1.645	
	排行第六以上	3.80	1.059	
家扶扶助	已停扶	4.25	1.416	$t=0.052$
	扶助中	4.24	1.402	
低收入戶補助	否（參考組）	4.18	1.376	$t=-1.613$
	是	4.29	1.423	
自評健康				$r=0.361^{***}$
心理困擾				$r=-0.378^{***}$
家庭關係				$r=0.415^{***}$

* $p<.05$, ** $p<.01$, *** $p<.001$

二、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多元迴歸分析

表 3 至表 5 分別為全樣本、12-17 歲及 18-24 歲群體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根據表 3 之模型 1，12-17 歲和女性青少年的幸福感較 18-24 歲及男性來得高。而自評健康與心理困擾也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力，亦即自評健康愈佳、心理困擾程度愈低，愈感到幸福。模型 1 未加入家庭關係變項時，模型解釋

力為 21.2% ($F=37.296$, $p<.001$)。在加入家庭關係變項後，模型 2 能解釋 28.8% 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變異性 ($F=50.291$, $p<.001$)。家庭關係對個人主觀幸福感具顯著效果，青少年的家庭關係愈佳，幸福感愈高；而且，模型 2 顯示性別已不具顯著影響力，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也發現，自評健康 ($Beta=0.195$) 和心理困擾 ($Beta=-0.218$) 對幸福感的預測力降低，而家庭關係 ($Beta=0.294$) 在模型 2 中具有最高的預測力。

表 4 為 12-17 歲青少年群體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型 1 在尚未加入家庭關係時 ($F=10.114$, $p<.001$)，調整過後的 R 平方為 0.179，即可解釋 17.9% 的變異性。當加入家庭關係進行分析後 (模型 2)，整體迴歸模型之解釋力提升，可解釋青少年主觀幸福感 25.5% 的變異量 ($F=13.688$, $p<.001$)。表 5 為 18-24 歲群體之分析結果，與 12-17 歲群體相似，在尚未加入家庭關係時 (模型 1)，可解釋 24.3% 的變異性 ($F=30.173$, $p<.001$)；在加入家庭關係變項之後 (模型 2)，模型解釋力提高，可解釋其 27.9% 的變異性 ($F=40.516$, $p<.001$)。由此可見，家庭關係為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重要因素。

在兩個年齡組的估計中，除了性別的顯著效果不同，其餘結果皆與全樣本估計結果相似。個人背景變項如父或母教育程度、家庭規模、家庭排行、家扶扶助以及低收入戶補助等與主觀幸福感間並未具有顯著的關係，而自評健康、心理困擾則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預測力。但在加入家庭關係變項之後，自評健康和心理困擾的影響效果與預測力皆下降，顯然家庭關係是預測幸福感重要之因素。整體而言，不論是哪一個年齡組的青少年，對於自己健康狀況評價愈高、心理困擾程度愈低、家庭關係越佳，其主觀幸福感越好。

表 3 全樣本之主觀幸福感迴歸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常數	3.303***	0.303		1.045**	0.349	
年齡	0.306***	0.081	0.096	0.313***	0.077	0.098
性別	0.151*	0.071	0.054	0.083	0.068	0.029
父或母教育程度	0.029	0.047	0.016	0.019	0.045	0.010
家庭規模	0.038	0.028	0.037	0.030	0.027	0.029
家庭排行	-0.036	0.040	-0.024	-0.027	0.039	-0.018
家扶扶助	-0.013	0.116	-0.003	0.008	0.111	0.002
低收入戶補助	0.107	0.071	0.038	0.103	0.068	0.037
自評健康	0.376***	0.041	0.252	0.291***	0.040	0.195
心理困擾	-0.472***	0.045	-0.286	-0.360***	0.044	-0.218
家庭關係				0.824***	0.072	0.294
調整後 R ²		0.212			0.288	
F		37.296***			50.291***	
N		1,618			1,618	

* $p<.05$, ** $p<.01$, *** $p<.001$

表 4 12-17 歲年齡組之主觀幸福感迴歸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常數	3.449***	0.592		0.939	0.709	
性別	-0.042	0.142	-0.015	-0.097	0.136	-0.034
父或母教育程度	0.089	0.094	0.047	0.053	0.090	0.028
家庭規模	0.026	0.058	0.025	0.014	0.056	0.013
家庭排行	-0.042	0.077	-0.030	-0.024	0.074	-0.017
家扶扶助	0.123	0.244	0.025	0.173	0.233	0.035
低收入戶補助	0.070	0.143	0.024	0.083	0.136	0.029
自評健康	0.415***	0.079	0.283	0.342***	0.076	0.233
心理困擾	-0.414***	0.090	-0.248	-0.267**	0.089	-0.160
家庭關係				0.874***	0.150	0.300
調整後 R ²		0.179			0.255	
F		10.114***			13.688***	
N		421			421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5 18-24 歲年齡組之主觀幸福感迴歸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係數	標準誤	Beta 值
常數	3.344***	0.355		1.171**	0.403	
性別	0.221***	0.083	0.079	0.148	0.079	0.053
父或母教育程度	0.010	0.055	0.005	0.007	0.052	0.004
家庭規模	0.042	0.032	0.041	0.035	0.031	0.034
家庭排行	-0.032	0.048	-0.021	-0.026	0.046	-0.017
家扶扶助	-0.055	0.133	-0.012	-0.042	0.126	-0.009
低收入戶補助	0.117	0.082	0.042	0.109	0.078	0.039
自評健康	0.362***	0.048	0.242	0.272***	0.046	0.181
心理困擾	-0.496***	0.052	-0.303	-0.394***	0.051	-0.241
家庭關係				0.810***	0.082	0.295
調整後 R ²		0.203			0.279	
F		30.173***			40.516***	
N		1,197			1,197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討論

經由實證分析後，家庭關係與青少年之主觀幸福感間呈現顯著正向關係，亦即家庭關係越佳，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越好；反之，家庭關係越差，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越低。此研究發現與先前學者所研究之結果相呼應（彭錦鵬、李俊達，2014；黃春太等，2008；Joronen et al., 2003），由於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場域仍以家庭為主，喜、怒、哀、樂等各種情緒也易受家庭影響，無論是家庭氣氛，抑或與家庭成員（如父母親、手足）之間的互動關係，皆會使青少年產生不同的情緒感受，進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盧妍伶與呂朝賢（2014）研究也指出，兒童幸福感歸因於其家長的陪伴，家長與孩子相處時間長、相處品質高，有利於增進兒童幸福感。因此，欲提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家庭互動關係之良窳是關鍵因素。

本研究也發現，青少年「自評健康狀況」會正向地影響其主觀幸福感。當青少年認為自己健康狀況越佳，其主觀幸福感越好；反之，青少年自評健康狀況越差，其主觀幸福感越低。此一研究結果與林衢良、林淑芬（2005）針對大學生幸福感之研究結果相似，大學生整體幸福感與其自評健康狀況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而個體可能因生理或心理等因素而認為自己不健康，但若個體能夠負起自身健康責任，注重自身健康，並實行對自身健康有幫助的活動與行為，對於提升其幸福感有幫助（余民寧等，2012）。另一方面，青少年對自己身體的主觀認知，關係著青少年自評健康狀況，進而影響其幸福感（吳枚瑛等，2018）。由此可見，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對自己身體的認知情形等，皆會影響著其對自我健康的評價。

此外，本研究尚發現，青少年之心理困擾與其主觀幸福感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係，亦即青少年心中的苦惱或困擾越多，其主觀幸福感越低。此結果同樣呼應過去研究結果（王爾暄等，2017；Flouri and Buchanan, 2003）。即便是青少年，仍有其階段性的苦惱或困擾的事件，青少年對於日常生活、未來、課業或家庭的管教型態等，皆會感到苦惱，無論苦惱或困擾的事件與因素為何，皆會降低其主觀幸福感。因此，要提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實不應忽略此因素。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 2017 年「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為資料來源，目的在於探討家庭關係對於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結果發現瞭解青少年的家庭關係愈差者，主觀幸福感愈低。再者，雖然本文原初關注的影響因子為家庭關係，但經研究分析發現，自評健康和心理困擾對於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據此，以下針對研究發現提出五點建議，作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擬定青少年福利政策及福利供給之參考。

（一）預防性福利服務政策之落實

家庭關係不佳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有不利的影響，建議青少年福利政策應從預防性服務著手，推動以家庭為基礎的福利服務或方案。目前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之社會安全網即「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作為主要服務模式，建置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一般家庭、脆弱家庭以及危機家庭多元性之福利服務。然而，若社會安全網在福利服務的規劃上，偏重脆弱家庭與危機家庭等高風險家庭之處遇，將導致一般家庭之預防性服務提供在資源有限情況下難以落實。因此，政府應強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角色與職責，落實各項支持性福利服務之供給，確保家庭成員發揮適當的功能，藉此增強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並提昇父母親職能力，改善親子互動關係。

（二）健全家庭功能，維繫家庭關係

當青少年在家中能夠獲得支持與依靠，並擁有穩定、正向的家庭關係，將有助於提升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因此，建議青少年或家庭政策應加強家庭功能的提升與增權，修復與維持家庭關係之和諧，維繫正向的家庭關係，進而提升青少年之主觀幸福感。

（三）落實及加強推廣親職教育，建立良好親子溝通管道

如青少年與其主要照顧者之間有密切的互動及緊密的連結，雙方良好的互動關係將可能引發其正向情緒感受，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而影響雙方的互動關係包含管教方式、溝通成效、支持陪伴等因素，這些也都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有關。據此，良好的親子關係應藉由親職教育的推廣，提供適當的管教方式，鼓勵主要照顧者對青少年有適度的期待，藉此增進高品質的親子互動，以提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

（四）強化青少年對自身健康之重視，負起自我照顧之責

自評健康為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因此，若能藉由傳授身體相關知能與保健知識，培養其重視生心理健康狀況，平日能適當保健身體，如規律運動、健康檢查、均衡營養。當身體出現異狀時，即能自我覺察並主動告知與就醫。另一方面，青少年在此階段所認知的自我身體意象也會影響其自評健康，相當在意自己外觀，故協助建立青少年身體意象的觀念同樣重要。建議協助其具備正確的審美價值觀，並在審美與健康間取得平衡，避免因過於追求外貌而忽略生心理的健康。

（五）協助青少年具備正確調節困擾與苦惱的能力

據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心理困擾愈嚴重，主觀幸福感愈低。倘若能培養青少年具備面對負面事件時的因應能力，必能使其在面臨困擾時，有效減少負面情緒感受，適時調節其壓力。

最後，本研究主要有兩點研究限制，首先，研究資料來源為「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屬於次級資料分析，然而次級資料並非以本研究之研究主題所設計，故青少年人格特質、家庭型態等相關背景因素的蒐集受到資料庫內容所限制，導致可能影響主觀幸福感之控制變項無法納入研究分析中。對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自編問卷以設計更貼近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面向，或相關調查如能深入關注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將對於提昇青少年主觀幸福感有幫助。

另外一個限制與樣本選擇（sample selection）有關，本研究對象為家扶基金會所扶助的青少年，主要來自經濟弱勢之家庭，缺乏與一般青少年進行比較，依此所獲得的結果僅限於弱勢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故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樣本組成，進一步分析家庭關係對來自不同家庭經濟狀況的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情形。

謝誌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研究結果（MOST 107-2813-C-020-005-H），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及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和指正。文中若有疏漏或錯誤，由作者自負文責。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王爾暄、李承傑、董旭英（2017）。〈國中生生活緊張因素、負向情緒調節能力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臺南市國中生為例〉，《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35: 31-61。
- 江守峻、陳婉真（2017）。〈經濟弱勢青少年的教師支持、同儕支持、家庭凝聚力與心理資本之關係：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分析〉，《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5, 4: 11-50。
- 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鐘珮純、趙珮晴（2012）。〈自覺健康狀態、健康責任、情緒幸福感及憂鬱關係之調查〉，《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38: 199-226。
- 吳枚瑛、陳香廷、魯盈謙、洪瑞兒（2018）。〈探討高雄市青少年自覺健康、身體意象及幸福感之關係〉，《教育科學研究學刊》，63, 1: 33-67。
- 呂朝賢、呂慧玲（2014）。〈教養方式與兒童幸福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8, 3: 79-101。
- 呂鴻基、林秀娟、吳美環、呂宗學、馮燕、邱南昌、李宏昌、林志嘉、何素秋、李孟智、吳春福（2014）。《臺灣兒童健康幸福指數：兒童的健康、教育及福利之綜合評價》。臺北：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臺灣兒童健康聯盟。
- 李志恭（2012）。〈大專學生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1, 2: 94-103。
- 林子雯（2000）。〈成人學生角色扮演、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正修學報》，13: 269-290。
- 林崇逸（2007）。《幸福與財富：幸福感影響因素之探討》。臺北：世新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碩士論文。
- 林惠雅、林麗玲（2008）。〈青少年知覺之家人關係型態與幸福感〉，《本土心理學研究》，30: 199-241。
- 林麗玲（2006）。《青少年家人關係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新北：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衢良、林淑芬（2005）。〈大學生運動習慣、自覺健康狀況與幸福感之調查研究：以聯合大學學生為例〉，《大專體育學術專刊》，94: 406-415。
- 柯旻伶、趙善如、陳婕誼、龔家琳（2015）。〈青少年家庭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模型建構之研究：以屏東縣國中生為例〉，《朝陽人文社會學刊》，13, 2: 23-50。
-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8）。〈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2015年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公共版）（D00165）【原始數據】〉。取自中

-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doi:10.6141/TW-SRDA-D00165-1。
- 許婷婷、林惠雅（2011）。〈青少年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母親依附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應用心理研究》，52: 149-179。
- 陳進義（2012）。《負向完美主義、苦惱自責、憂鬱及國中生自我傷害行為》。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錦宏、陳億倖、陳俊鶯、薛素霞、邵文娟、王姿乃、陳宏、陳快樂（2008）。〈青少年自殺意念與自殺未遂之相關因子研究〉，《臺灣精神醫學》，22, 1: 57-66。
- 陸洛（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 1: 115-137。
- 彭錦鵬、李俊達（2014年12月6-7日）。〈影響主觀幸福感因素之研究〉，發表於「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 黃春太、姜逸群、黃雅文、胡益進（2008）。〈臺南縣國中生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29: 27-50。
- 黃韞臻、林淑惠（2008）。〈大學生幸福感之組成與比較〉，《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學報》，12, 9: 19-31。
- 葉光輝、吳志文、王敏衡（2016）。〈知覺滿足需求的教養與青少年的適應表現：雙元自主能力的跨時間中介效果檢驗〉，《本土心理學研究》，45: 57-92。
- 葉秀珍（2014）。〈生活品質研究的測量、理論與分析〉，《國家與社會》，16: 1-40。
- 劉亭秀、陳柏霖（2017）。〈弱勢家庭國中生親子關係、學校生活適應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31, 2: 85-98。
- 劉熒潔、劉嘉珮、王筠雅（2013）。〈以社會支持觀點探討使用者在網路社群的幸福感知：以 Facebook 為例〉，《資訊科技國際期刊》，7, 2: 23-33。
- 鄭清霞、呂朝賢（2013）。〈國小孩童的福祉衡量指標初探：一群 10 歲兒童的主觀經驗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7, 1: 31-173。
- 盧妍伶、呂朝賢（2014）。〈家庭結構與兒童幸福感〉，《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 2: 95-126。

二、中文譯著

- Ben-Arieh, A. and Frønes, I. (2009/2011)。《兒少福祉指標：多元文化觀點下的理論與實踐》，黃聖峰、鍾青萍譯。臺中：內政部兒童局、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三、英文書目

- Angner, Erik (201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9, 3: 361-368.

- Bjarnason, Thoroddur, Pernille Bendtsen, Arsaell Arnarsson, Ina Borup, Ronald Iannotti, Petra Löfstedt, and Birgit Niclasen (2012).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ldren in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36 western societies. *Children & Society*, 26, 1: 51-62.
- Brown, Susan (2004).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well-be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arental cohabit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2: 351-367.
- Cai, Shu and Park Albert (2016). Permanent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30: 298-319. doi:10.1016/j.jebo.2016.07.016
- Cuesta, Maite Bla'zquez and Santiago Budr'ia (2012).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0, 4: 655-682.
- Dinisman, Tamar, Sabine Andresen, Carme Montserrat, Dorota Str'ozik, and Str'ozik Tomasz (2017).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from the child well-being perspective: Finding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80: 105-115.
- Fattore, Toby, Jan Mason, and Elizabeth Watson (2007). Children's conceptualisation (s) of their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0: 5-29.
- Flouri, Eirini and Ann Buchanan (2003). The role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mother involvement i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3: 399-406.
- Hayes, Natalie and Stephen Joseph (2003). Big 5 correlates of three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 4: 723-727.
- Joronen, Katja, Paivi Åstedt-Kurki, Eija Paavilainen, and Pekka Laippala (2003). Adolesc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amily dyna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 17, 2: 129-138. doi:10.1046/j.0283-9318.2002.00118.x
- Låftman, Sara Brolin (2010).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ren's living condi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4 countrie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3, 1: 127-147.
- Niaz, Asadullah, Mohammad Xiao Saizi, and Yeoh Emile (2018).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2005-2010: The role of relative income, gender, and loc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 83-101. doi:10.1016/j.chieco.2015.12.010
- Olson, David (1985). *FACES III (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Scales)*. St. Paul,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Robson, Karen (2010).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well-being of British children: Evidence from a fifteen-year panel stud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3, 1: 65-83.
- Saunders, Peter and Chen Ke-Mei (2015). Depriv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5, 2: 80-95.

Thomson, Elizabeth and McLanahan Sara (2012). Reflections on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well-being: Economic resources vs. parental socialization”. *Social Forces*, 91, 1: 45-53.

四、電子資料

〈2017 年兒童福祉調查〉。兒少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s://www.children.org.tw/research/detail/67/1019>。點閱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06 年死因統計〉。衛生福利部，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S/lp-3960-113.html>。點閱日期：2020 年 4 月 29 日。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理念〉。社團法人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網址：<http://www.youthrights.org.tw/about/notion>。點閱日期：2019 年 5 月 7 日。

The Effec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Yi Chen¹ Ke-Mei Chen²

Abstract

Family relationshi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However,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link betwee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aged from 12 to 24 years by applying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The data employed came from the Taiwan Databa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verty (TDCYP) collected in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relationship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ther words, high level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may contribute to high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esides, the findings identify the factors including self-rated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at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In brief, family relationships, self-rated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have significant rol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s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Life satisfaction, TDCYP

¹ M.S.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²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Ke-Mei Chen, E-mail: kmchen@mail.npust.edu.tw

Received: 2019/03/11; Accepted: 2019/06/20